

【研究討論】 Research Notes

戰後初期日本「中國研究」的延續與斷裂
The Continuity / Discontinuity of China
Studies in Postwar Japan

邵軒磊
Hsuan-Lei SHAO*

*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壹、研究背景

後冷戰時期東亞的國際局勢正以空前的變遷方式進行著，隨著冷戰東西格局的突破，加上原有東亞島弧的戰略價值減弱，以中日兩國的「歷史認識問題」代表，東亞國家各自的雙邊與多邊內部關係矛盾漸漸浮現。各國學者在各種爭辯的場合上，不斷使用「全球」、「亞洲」、「東亞」與「各國族」等等各種互斥而又相容的概念（論述），¹這些論述不只是共識問題，也實際造成了政治經濟外交各層次影響。由建構主義觀點視之，一個國際行為主體對另一個行為主體的定位（想像及觀感等），將會左右其行為，²也就是說若想瞭解日本與中國真正互動的源由，必須對相互認識與認同的問題加以注目。具體而言，吾人常在許多的中國大陸文獻或輿論中常常以「反省／不反省」的認識框架，對日本的社會意識加以批判，甚至指責日本「戰後未曾反省」。其中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在二〇〇四年九至十月所作的民意調查為例，有超過半數的中國民眾討厭日本，討厭的人其中又有超過半數的原因是「日本未曾反省」；³然而對於一般日本人而言，日本的戰後反省似

1 本文所使用的論述（discourse / parole）採取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方法論，關注三種層次的意義：一、一種群體中所使用的一套溝通符號；二、這些符號如何被實際使用的具體例子；以及三、這些意義如何發生與帶動使用各種社會的、技術的、制度的和經濟的因素，用以吸收並實踐的條件。深入的討論參見：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2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4).

2 石之瑜的研究指出，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分野雖然重要，但兩者彼此間常常因為時間與歷史背景的不同，而產生定義上的不同，因此這兩種主要國際關係的視角，必須回到國際政治決策者層次的研究。進一步強調對「國際政治行為」的基礎必須回到決策者對國際關係的「認知」上。也就是國際關係的建構主義學派。參見石之瑜：《後現代的政治知識》（臺北：元照出版社，2002年），頁10-12；而實踐者的能動性，也進一步說明國際關係中，個人主體在不同政治領域（包括國際關係）上的辯證可能性，從而建立起互動的正當性與基礎。對於個人層次或建構主義層次理解，更深入的討論參見李英明：《國際關係理論的啟蒙與反思》（臺北：揚智文化，2004年）以及石之瑜：《社會科學知識新論：文化研究立場十評》（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04年）。

3 「本次調查中感到非常親近和親近者共186人，占被調查者總數的6.3%，而感到不親近和很不親近者共1604人，占53.6%。」、「在感到不親近、很不親近的理由（100%）中，選擇日本近代侵略中國者占26.0%，日本至今沒有認真反省侵華歷史占61.7%。」參見蔣立峰：〈中國民眾對日本的不親近感顯著增強〉，《日本學刊》，2004年第6期（2004年11月），

乎無庸置疑，這也是至今中日雙方沒有歷史共識的重要因素之一。若要知道此一答案的真實，也許必須真正面對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才能判斷。尤其是「反省」一詞，涉及的是主體的同一性與意識的斷裂性，因此本文針對戰後思想的延續與斷裂來具體考究。

從歷史上看來，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至深，⁴歷史上日本最早有系統認識中國思想的起點為聖德太子時期，⁵在德川時代歷經朱子學、徂徠學、宣長學的變化，奠定了日本思想的基本思考框架。十九世紀之後東洋學系列（包括後期的支那學）的開展，建立了日本自我的形象與其他「萬國」加以對照，從而日本本身民族的獨特性由此開始奠基。⁶雖在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中，開啟了日本民族主義與亞洲主義的思維，⁷並且最終以與中國發生戰爭作為高

<http://jjs.cass.cn/files/xuekan/2004-6/2thdiaocha.htm>。

- 4 日本民族的起源與由來，日本通說認為在人種方面是冰河時期日本列島與大陸相連而遷徙；而文化方面除了三國開始的接觸之外，從五世紀開始由「大陸渡來人」開始系統的學習科學技術，而六世紀開始，儒教、五經、醫、易、曆、佛教等中國文化也漸漸成為日本文化的主幹。參見井上光貞等：《日本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94年），頁3-5。其他相關的論點有佐々木高明、森島啓子：《日本文化の起源：民族学と遺伝学の対話》（東京：講談社，1993年）；江上波夫（編）：《論集日本文化の起源》（東京：平凡社，1984年）。而中國方面的研究者也多持此一立場，參見王志軍：〈日本人姓氏起源及其中國文化痕跡〉，《焦作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年第4期（2003年4月），頁18；李建權：〈試論日本民族文化的形成及特點〉，《日本研究》，2004年第1期（2004年2月），頁64。
- 5 關於日中文化交流的起源，中文圈主要的研究請參閱梁榮若：《現代日本漢學研究概觀》（臺北：藝文圖書館，1972年）；孫歌：〈漢學的臨界點——日本漢學引發的思考〉，《世界漢學》，1998年第1期（1998年1月），頁47。
- 6 甚至有研究者將這段時間往前回溯到十八世紀的德川時期，參見Peter Nosco, "The Place of Chin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Japan's Early Modern World View", *Taiw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4, 1 (June, 2007), pp. 27-47.
- 7 雖有論者提出對於「亞洲想像」事實上也是一種建構，中日韓彼此的差異早在十七世紀就漸漸成形，因此「東亞」作為一種整體概念必須相當小心。參見葛兆光：〈地雖近而心漸遠——十七世紀中葉以後的中國、朝鮮和日本〉，《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3卷，第1期（2006年6月），頁291-292。但在學科史的考察中，一般還是直到近代結束之前，亞洲（東洋、アジア）還是能夠作為觀念論的整體而存在，參見陳瑋芬：〈由「東洋」到「東亞」，從「儒教」到「儒學」——以近代日本為鏡鑑談「東亞儒學」〉，《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1卷，第1期（2004年6月），頁209。

峰，⁸其中隱含的是日本對東亞觀念⁹的重視。這樣的思維，也同樣表現在後冷戰時期日本面對中國與亞洲的心理機制上。¹⁰

戰後日本開始對亞洲與中國觀念的重要轉折。一般認為，戰後日本在物質與精神上與帝國思想產生斷裂，而中國本身的動盪更加劇了中國研究者的心理掙扎。¹¹但是考慮到實際上研究者大部分屬於「舊滿鐵調查部¹²與舊東亞研究所¹³的職員」¹⁴的中國經驗，戰後的研究也與這種經驗無法截然斷裂。因此在問題意識上，本文注意到此時「延續／斷裂」兩種特色應有並存的現象，所以藉由對當時思想系譜的考察，指出什麼是此間知識發展主要的因

-
- 8 十九至廿世紀前期在「近代化」的過程之中，日本勢必提出一套自己的世界觀來與現有既存的中國的世界觀（華夷秩序）對抗，從現在的眼光來看，就是「亞洲」，事實上此一觀念嘗試過將「亞洲/日本/中國」採取各種定位，但其中的共通性就是這三者都必須存在。從而日本提出「東亞協同體」，之後又擴大為「大東亞共榮圈」，其中所包含的亞洲論述一直是近現代日本歷史、政治、國際關係的必要關鍵字。日本學者不斷從各種型態來表述亞洲的範圍與型態，遠遠高於其他文明，最早追溯到近代化之父福澤諭吉（1834-1901）的〈文明論概略〉與〈脫亞論〉開始，到現代的竹內好、子安宣邦、溝口雄三、濱下武志等人。
 - 9 對於戰前亞洲觀的由來與面向，張崑將把日本的亞洲觀念以一八八七年為界，分為兩期：前期是日本民族使命；後期是粉飾天皇主義對亞洲侵略的理念；參見張崑將：〈關於東亞的思考「方法」：以竹內好、溝口雄三與子安宣邦為中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1卷，第2期（2004年12月），頁267-270。
 - 10 石之瑜：〈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4期（2006年4月），頁12-13。
 - 11 村松祐次：〈戰後日本の近代中国研究の動向〉，《一橋論叢》，第23卷，第1期（1950年1月），頁45。
 - 12 最早是東京帝國大學學者白鳥庫吉在日俄戰爭時遊學了歐美各國，受到各國的「亞細亞研究」的刺激。回國後也主張要經營日本的亞細亞研究。同時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的初代總裁後藤新平也主張「為了滿州經營的目的，要有文裝的武備」，主張「學俗近接」，造成了白鳥與後藤合作的契機。……一九〇七年設置了滿鐵調查部。參見伊藤一彥：〈日本の中国研究〉，收於安藤正士等（編）《現代中国研究案內》（東京：岩波書店，1990年），頁5。
 - 13 依照伊藤的補充：東亞研究所則是由企畫院調查官中佐「池田純久」提案，於一九三八年九月設立，隸屬於企畫院的財團法人，總裁是當時的近衛文磨首相。對於日中戰爭進行所必要的中國各地區與人文自然的調查協力，純粹的國策機關，在敗戰後解散。參見前揭文，頁8。其中主要的研究者有：田畑茂二郎、山上次男、酒井忠夫、山本秀夫、小原正治等。這些人大多在戰後也活躍於學政界中。
 - 14 山根幸夫：〈現代：戰後の日中交流とわが国中国現代史研究の背景〉，收於山根幸夫（編）《中国史研究入門》（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頁498。

素？新的研究方法（社會科學）的形成如何與傳統研究方法（東洋學¹⁵）產生延續或斷絕？而重建的過程中，又是哪些思想要素成為主要的構成部分？

貳、先行研究與研究架構

本節茲將現有研究成果中關於此一時期的整體圖像描述整理如下：山根幸夫認為在一九五八年前，中國研究特色由「民間」研究團體出發，致力於將成果向社會發表。¹⁶這些研究者的中國情懷與實際中國經驗，使前期中國研究具有原始資料上的優勢，研究中國時也不可避免帶有感情，是因為與戰時體驗和生命歷程息息相關。¹⁷其次久保和江田指出一九八〇年前學界主要為意識形態方法論的分歧，其中的主軸是社會主義路徑（革命中心史觀）與實證主義路徑（近現代化史觀）的爭辯。¹⁸雖然文中沒有明確說明，但推論得知是將「研究方法改變」作為主要分期觀點。嚴紹盪的論文則從「中國觀」做出說明，指出對於戰後二十年間是「反省和原罪中國觀時期」，原因共分為四個方面：日本戰爭失敗、日本是亞洲地區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激進民主人士推廣革命、中國政府以德報怨，¹⁹是較為宏觀的綜合敘述模式。以下將中日兩國對戰後初期學術系譜的特色歸納與原因表列如下（參考表一）。

15 「東洋學」的範疇十分廣大，起初是相對於日本傳統漢學而言的一門「學科」，受到歐洲漢學影響而建立，注重「整體」（如：通史）的思考模式，但同時也有「東方主義色彩」。參見川島真：〈近年日本中國史研究的變化〉，《台大歷史學報》，第22期（1998年12月），頁126。由於本文關注研究「中國政治、社會、歷史」部分，因此較為偏重「東洋史學」部分，本文中採用的定義除了援引川島一文的理解脈絡之外，對於戰時所發展的「田野研究」模式，也歸入「東洋學」的發展脈絡之中。但受於篇幅所限，本文不擬詳細說明，對於東洋學發展的討論，可參見江上波夫：《東洋学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年）。

16 山根幸夫：〈現代〉，頁488-539。

17 如前所述的「滿鐵、東研」研究者，參見村松祐次：〈戰後日本の近代中国研究の動向〉與伊藤一彦：〈日本の中国研究〉。

18 久保亨、江田憲治：〈現代〉，收於礪波護等（編）《中國歷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6年），頁264-289。

19 嚴紹盪：〈戰後60年日本人的中國觀〉，《日本研究》，2005年第3期（2005年6月），頁2-3。

表1：戰後中國研究特色之先行研究比較

作者及寫作年代	山根幸夫 1983	久保亨、江田憲治 2006	嚴紹盪 2005
戰後初期特色	人員延續與近代思潮衝擊	意識形態為核心的辯論	感到反省和原罪
原因	研究成員由帝國轉為民間、與在感情上對戰爭的反省	研究方法造成史觀改變	戰敗、馬克思主義、日本人士推廣、中國以德報怨

(資料來源：由作者自製)

以上的論文對於戰後學界的情況都有詳盡的考究與描寫，但共同的是對於「學問延續性」都採取了斷裂的態度，如圖一所示，山根從研究成員的身份、久保和江田從研究史觀的改變、嚴紹盪從反省和原罪的角度，都假設了戰後的研究與戰前大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同時，除了山根提及研究者生命經驗的影響之外，其他文中幾乎未注意到研究者延續性的層次。因此本研究嘗試以當時學界的主要思想與研究產出為中心，對當時的學術系譜做出還原，並提出關於「知識如何轉變」的考察。²⁰並且藉由這個考察，建立日本中國研究界的全體性圖像，尤其在著重於社會、政治、經濟等領域的現代中國研究，冀能提供後續相關研究一個較為宏觀的概念。

必須注意的是，思想的轉變是漸進式的，若想找到「斷裂」式的分期點在現實上並不可行，但為了理解方便，本文權將一九四五到一九五八年作為本文研究範圍。首先，日本戰敗也代表了對戰時中國論述（包括其背後的亞洲論述與進步史觀等）產生了「失敗」，²¹首要之急是被迫要採用另一套論述和思考來重新定位自己，從而帶來了戰後知識界興盛的和平主義、民主主

20 張崑將舉出三種日本知識份子的反省路徑，分別為竹內好的「否定後重生」、溝口雄三「超越中國的中國學」和子安宣邦的「思考方法取代實體的東亞」，相當程度而言具有代表性。張崑將，前引書，287。本文試圖不只對思想「主張」轉變加以說明，而更加入對於「學術研究／整體社會」的關係。

21 也就是說，一九四五的戰敗與一九四九社會主義中國建政，意味著以帝國日本為中心的東亞協同體重構和以此為基礎的世界秩序重組構想的徹底瓦解。同時也意味著，將自己與他者中國差異化，並與歐洲同化的日本近代化路線受到挫折。參見子安宣邦：《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趙京華（譯）（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87。

義、社會主義思潮。這三種觀點在安保運動²²中達到高峰，之後更由知識份子組成「安保改定阻止國民會議」²³，號召全日本各種民間團體參與這個活動，包括研究者藉由「知識共同體超越自己的領域，團結起來。」²⁴由此可見，此間當時的研究者之間已經發展出相當的團體。這種力量與社會環境，更是在研究戰後「中國研究」時不可忽略的社會背景。而終點定為一九五八年的原因，除了前述「知識共同體」的影響之外，在研究方法上由一九五八年成立之亞洲經濟研究所和一九六〇年成立的外務省所轄財團法人國際問題研究所，是日本政府成立之「政策智庫型」研究機關，代表的是官方作為主導機關以及美國式的區域研究途徑產生了影響。此外一九五七年長崎國旗事件，使得日中貿易、交流中斷的結果，資料來源受到限制，山根認為「對於中國研究的資料取得與研究者的中國印象產生了影響」。²⁵這使得日本中國學者面臨研究資料來源的現實問題，造成脫離實證主義的脈絡，研究者轉而致力於理論方面；並由此對傳統史學與東洋學造成方法論上的挑戰，中國研究又面臨另一層次的變化。

綜合以上觀點，本文研究主軸在於藉由回溯日本戰爭結束後一直到學界大致恢復雛形的十數年間，如何建立（或是說重建）起中國認識的基礎與思辨的過程。本文將介紹學界對於「研究反省／近代化路徑」演變到「革命史觀／時代區分論」的斷裂面向，以及對「東洋學／實證研究」持續關注和使用的連續面向。從而日本研究者一邊對被研究者（中國）建立更全面的研究角度，也要一邊關注日本社會氣氛，甚至反省研究者對自身的定位。本文藉此闡述當時思想「連續／斷裂」的兩面性特色。

22 安保運動是因為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九日岸信介前往美國簽訂安保條約。關鍵點在於名稱由「日米安全保障條約」改為「日米相互協力及び安全保障條約」，增設了對於「自由有關制度強化」、「取消國際經濟政策不一致之處」、「經濟協力促進」等等對於軍事／政治／經濟等等「相互協力」的點。參見安藤良雄等：《日本の新生》，《日本の歴史》，13（東京：讀賣新聞社，1973年），頁220。

23 前掲書。

24 都築勉：《戰後日本の知識人——丸山真男とその時代》（東京：世織書坊，1995年），頁11。

25 山根幸夫：〈現代〉，頁491-492。

參、一九四〇年代後半：對發展方向的再思考

戰爭結束後，日本社會面臨物質困難²⁶與精神失落問題，學界也開始因應這個處境而找尋對於自身處境的一套論述解釋。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學界主要致力在在民主主義與發展路徑的研究，其中直接批判戰時皇國史觀與「大東亞共榮圈」價值觀的理念。

一、對於原有研究的反省

史料表示，學界在停戰到冷戰體制建立起來的短暫期間中，主要的思考方向在「反省」之前的中國研究觀點。最早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以滿鐵東研從業人員為中心計畫組成「中國研究所」，²⁷創辦人之一的平野義太郎主張日本知識人應該徹底反省戰爭責任，以民主主義取代軍國主義，並且鼓勵學術人實踐理想。²⁸該所以「面向中國」為核心宗旨，基本的研究方針有：對現代中國真實把握為目的之「綜合研究」、以現代中國為中心的「國際關係研究」、外國的現代中國研究的調查、關於日本中國調查研究及其檢討、亞洲諸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研究、有關日中貿易的調查研究。²⁹

26 由於戰後經濟並非本文重心，此處以嚴紹盪文中所述作為背景基礎：「日本1946年的經濟情況為：鋼產量為80萬噸，相當於1941年的15%；煤產量為6330萬噸，相當於1941年的21%；石油的庫存量为494萬桶，是1941年的10%。全國當時除了空氣可以自由供給以外，生活的所有物品完全實行了配給制度，每天每人的糧食為290克，其中40%為豆類。……總數大約有1800萬人立時變得無家可歸。」參見嚴紹盪：〈戰後60年日本人的中國觀〉，頁1。

27 在一九四六年一月於東京大塚「東洋文化研究所創立總會」舉辦後，主要的中國研究中心人物也順勢在當時組成了「中國研究所籌備會」，包括平野義太郎、石濱知行、伊藤武雄、堀江邑一、具島兼三郎、岩村三千夫、中西功、尾崎莊太郎、野原四郎、幼方直吉等等。十月，中國研究所正式運作。參見山根幸夫：〈現代〉，頁498。

28 後來由於福特基金會事件、甚至文革時，日本的中國研究界嚴重對立，互相攻擊。野澤認為是源於戰後知識份子過度實踐所致：「乍看之下十分合理的說法，但在實踐上卻出現黨同伐異」。野澤稱其為「禍根」。參見野澤豐：〈アジア研究の戦前戦後〉，收於歷史學研究會（編）《アジア現代史》（東京：青木書店，1985年），頁12。

29 幼方直吉：〈わが国における東洋学研究的特色——中国研究所〉，《學術月報》，第7卷，第8期（1954年11月），頁485。

另一方面，個別的史學者紛紛撰文主張要「重新研究」中國，包括對政治參與較深的中西功與野阪參三致力於研究中國革命與日共黨內路線。鹿地垣、青山和夫（黑田善次）、伊藤武雄等等屬於歸國學人，引進相當多的西方立場；法學者高橋勇治及根岸佶、村松裕次、香川俊一等從事實證方面的研究。³⁰而文學方面主要的研究團體是戰前就持續存在的「中國研究會」，其中成員有竹內好（現代中國）、武田泰淳（文學）、岡崎俊夫（新聞時事）等等。³¹

在研究視角的討論方面，以戰後最早以整體性視角談論中國學界的文獻是波多野善大，他指出，東洋史必須將所研究的範圍要從王朝轉為庶民；研究方法要遵從「科學的」³²社會經濟史方法；發表形式上也不要再用艱深文字，要讓學術得以充分流傳。³³這是在研究的本質上，以馬克思主義為藍本的思維模式的興起。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強烈期盼中國研究必須成為「科學」，甚至排斥原來的以採訪形式報導中國所見所聞而發表評論的「支那通」³⁴研究方法。藤原定在一九四七年為文指出：「大正時期山路愛山就說過，支那通的中國知識不過是片段的，不存在作為全體的徹底理解。……而現在中國史，以至於東洋史的全體理解，依然沒有具體的結論。」³⁵此處的「全體理解」，正是後來馬克思主義者所強調的方法論優點所在。

30 參見今崛誠二：〈中国歴史学界の展望〉，《東亞論叢》，第6期（1948年4月）。引自姬田光義：〈中国革命と中国革命史研究について〉，《現代中国研究》，第7期（2000年9月），頁20。

31 山根幸夫：〈現代〉，頁498。

32 此處的科學，甚至日本學界一九七〇年之前的「科學」，很大一部份都意指馬克思主義。

33 波多野善大：〈終戰後一年間の東洋史学界〉，《東洋史研究》，第8卷，第6期（1947年6月），頁96。

34 甚至更輕蔑的稱呼是「支那浪人」。

35 藤原定：〈中国研究の課題性と大眾の思想〉，《中国研究》，第1期（1947年7月），頁56。

二、「近代」意義的轉變

此時雖然馬克思主義已經浮現，但史學界的主要思維表現在一九四九在歷史學研究大會的論題「世界史的基本法則」上。³⁶簡單的說，以討論「英法為主的西歐發展路徑，是否能在亞洲表現出來。」這個問題，規定出一套「原始共同體到共產主義的交替路程」³⁷來作為國家的發展階段。因此當前史學的任務就是用「比較史」的方法找到個別國家的發展位置，或是把某一國家為何處於該位置的做出解釋，無庸置疑。學界由此開始逐漸反對「亞洲停滯論」（亞洲的歷史並無法往前發展），³⁸試圖證明亞洲進步的可能性，完全具有馬克思主義的色彩。而成瀨治在一九五〇年藉由對德國歷史學界的研究也呼籲：「自我省察」與「世界史的思維」是現在日本史學界的兩大要務，並對當前的學者賦予責任的呼籲。³⁹這篇文章代表了日本學界在戰後試圖直接面對戰爭，以及對學術的社會責任做出倫理學式反省的公開著作。⁴⁰

但是這段時期只停留在對於「亞洲停滯論」的反省，而非對亞洲價值的肯定，仔細檢視當時的一系列研究，都還是回到了「歐洲發展路徑」之上，而有所謂官府史學的論爭。意指戰後以東京為中心的「東洋史學界」將東洋／中國的傳統持否定／悲觀的態度，回到了相信西方近代化的途徑。所以這不

36 本會在五月十四、十五兩天召開，歷史學研究會在會後將大會報告編為《世界史の基本法則》一書（東京：岩波書店，1949年）。在其中以「歷史的原動力正是基於歷史各時期中所存在的各種矛盾」（頁1）為主軸，試圖找到世界史的基本法則；並且要以此打破舊有史學的區域別、時期別研究劃分，主張史學應只分為原始（古代）、封建、近現代三個部分。（頁1）無獨有偶，史學會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至六日的大會之中，江上波夫發表主題演講「世界史的構想」，提出要重視人類文化的歷史，也就是人類史的世界史。參見史學會：〈史學會第48回大會記事——公開演講要旨〉，《史學雜誌》，第59卷，第5期（1950年5月），頁456。就時間點來看，江上的演說可說是部分回應了歷史學研究會的訴求，雖然觀點較諸歷史學研究會有一點不同，但也可以看出當時日本史學界對於「世界史」問題的重視。

37 遠山茂樹：〈世界史把握の觀點〉，收於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歴史学の方法とアジア》（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66年），頁3。

38 前掲書，頁3。「亞洲停滯論」在日本的亞洲主義思維中，一直佔有重要的角色，也是「脫亞」一脈的重要理論工具。

39 成瀨治：〈ドイツ歴史学界の現況と今後の課題〉，《史学雜誌》，第60卷，第2期（1951年2月），頁54-62。

40 這種視角之後被安藤評論為：「以中國作為媒介，讓日本人與近代對決」。參見安藤彦太郎：〈東洋史回顧と展望〉，《史学雜誌》，第60卷，第5期（1961年5月），頁625。

僅是「對特定階段的發展的必然繼起」的信仰，也是把中國和日本放在前近代的階段（封建或半封建），背後的意義體現了日本在西方面前屈服而失去自信的樣態，「這就是終戰以來，日本的日本觀與中國觀的基調。」⁴¹戰後初期對東洋採取否定／悲觀的態度的學者，包括津田左右吉、戒能通孝主張亞洲還是必須向歐洲學習，才能脫離「停滯」。⁴²

簡而言之，此一期間日本對於敗戰的理解，並不是「近代化是不對的」，而是從「近代化的方式不對」，否定「天皇制近代化」與支持「民主式近代化」。這表示了中國研究（東洋學）雖然確實產生了轉變，但是反而更體現了大正（甚至明治）時期的東洋學特色，若以「脫亞／興亞」二元對立的思維來看的話，較為接近「脫亞」一邊。

三、戰前調查研究的產出

具體而言，一九四九年之前學界相當重視理論、體系化式的研究。藤原表示「（對現今的種種問題）不對於歷史社會有全體的理解，是不能回答的。」⁴³以野原四郎在〈東洋史的新立場〉的主張為代表，認為「東洋史研究要與過去支持中國研究的日本帝國主義一起崩壞，而以真正科學的教育與研究態度來從事」，特別指出要對於「農村共同體」的存留與（現正進行的）崩壞有全體認識。⁴⁴依照前節所述探討「世界史的法則」的動機下，日本學界產出了大量利用民俗調查（實態調查資料）的研究成果。⁴⁵

41 村松幼次：〈戰後日本の近代中国研究の動向〉，《一橋論叢》，第23卷，第1期（1950年1月），頁62。

42 前掲書，頁53。

43 藤原定：〈中国研究の課題性と大眾の思想〉，頁57。

44 野原四郎：〈東洋史の新立場〉，《中國評論》，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轉引自村松幼次：〈戰後日本の近代中国研究の動向〉，頁47。

45 上原淳道、山根幸夫：〈回顧と展望〉，《史学雜誌》第59卷，第5期（1950年5月），頁45。

代表性的文獻包括：旗田巍的〈華北村落における協同關係の歴史的性
格〉；⁴⁶〈華北農村における開葉子の慣行〉，⁴⁷對從來的「中國農村共同
體」的主張加以反駁，指出村落生活的基礎在於農業生產，現實少有內部制
約與村民合作。」以及清水盛光〈中国に於ける看青と落穂拾ひの俗につい
て〉。⁴⁸村松祐次〈楽城県と寺北柴村——中国の県と村〉，⁴⁹根岸佶〈上海
錢業ギルド〉，⁵⁰内田直作〈中国における商業秩序の基礎〉，⁵¹以上都是在
戰時的調查（北支慣行調査資料）等文獻的基礎上寫作的，在研究中特意使
用生產力與生產方式的途徑，找出中國當時的生產力生產關係處於何種社會
形態，並以此對於「中國停滯論」提出反駁。

肆、一九五〇年代：社會主義中國的影響

一九四九年社會主義中國「建國」，更對造成日本學界造成衝擊，研究
者群體分為社會主義陣營以及反共陣營兩種極端思維。⁵²前者以「中國研究
所」為代表組織，成長極為迅速，成員中不乏中國研究界的重要學者。⁵³在五

46 旗田巍：〈華北村落における協同關係の歴史的性格〉，《歴史學研究》，第139期（1949年5月），頁1-23。

47 旗田巍：〈華北の農村における開草子の慣行〉，《史學雜誌》，第58卷，第4期（1949年10月），頁43-54。

48 清水盛光：〈中国に於ける看青と落穂拾ひの俗について〉，《東光》，第7期（1949年1月），頁57-68。

49 村松祐次：〈楽城県と寺北柴村——中国の県と村〉，《一橋論叢》，第22卷，第1期（1949年7月），頁180-207。

50 根岸佶：〈上海錢業ギルド〉，《一橋論叢》，第22卷，第1期（1949年7月），頁150-179。

51 内田直作：〈中国における商業秩序の基礎——牙行制度の再検討〉，《一橋論叢》，第22卷，第2期（1949年8月），頁49-73。

52 姬田光義：〈中国革命と中国革命史研究について〉，頁21。

53 其中不乏有中國研究的重要學者，包括：理事長平野義太郎、理事伊藤武雄、野原四郎、淺川謙次、岩村三千夫、小野忍、川勝傳、森下泰、幼方直吉、尾崎莊太郎、具島兼三郎、小岩井靜、名和統一、三島一、米沢秀夫、小野忠、白神徹。監事鈴木一雄、石橋東洋雄等人。幼方直吉：〈わが国における東洋学研究的特色〉，頁485。

○年代之後，社會主義成為日本對中國的基本視角與主流研究方法。本文從下列三個面向來說明日本現代中國研究在五○年代的蛻變過程。

一、革命史觀⁵⁴

從一九四九年開始，由於中國內戰結束，一直被戰時日本視為「落後」的中國，居然在馬克思理論的指標上超越日本。這個事件使得日本內部知識界的思考，將環繞天皇制的討論，延伸到社會主義路徑問題，並且把中國革命放在日本未來出路的參考點上。日本學界對中國的感情為之一變，認為中國能藉由革命來與過去斷裂，從而提出了「日本是不是也該革命？」這種疑問。⁵⁵這也就是到文革之前在中國學界佔有絕對主導地位的「革命史觀」。⁵⁶其最重要的理解關鍵是：以革命為中心描述中國歷史，把「中華人民共和國革命」視為最重要的革命事例。⁵⁷持此論點的學者以「中國研究所」有關人員為主要代表人物，除此之外在歷史學界則以「歷史學研究會」為主要代表團體。

國共內戰的結果意味著亞洲在馬克思的路徑上超越了大部分歐洲，導致了當時以野澤豐為中心，尾崎秀樹、伊藤武雄、鈴江言一等學者的「中國統一化論爭」成為重要的指標。⁵⁸由於當時支持革命的學者迫切的想跟中國來往，並提倡「國民的歷史學」，以歷史學研究會為主要角色，而其他「友好人士」包括了文學的竹內好、東洋史的仁井田陞、法治史的福島武夫、經濟的本橋淳／米澤秀夫、國際關係的江口樸郎也都扮演了十分活躍的角色。當

54 關於革命史觀的詳細介紹，請參考邵軒磊：〈革命史觀與戰後日本中國研究之社會主義系譜〉，《中國大陸研究》，第50卷，第4期（2007年12月），頁117-134。

55 姬田光義：〈中国革命と中国革命史研究について〉，頁20-21。

56 但是（在民間層次）隨著GHQ的反共態勢明朗化與戰犯釋放等等舉動，使得革命思潮受到挫折。也造成了「日本人不完全民主主義的戰爭觀與世界觀」。參見前揭書，頁20-21。呼應前述子安宣邦的看法，則可以發現日本知識界中，對外國因素的敏感。

57 以仁井田為代表，認為：毛所採用的路徑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依照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意義結合所生成的方法。帶有從根本在階級間將權力移動的性質，因此中國的革命正是第一個能夠稱為「革命之名的革命」。參見仁井田陞：〈中国近代革命の歴史的課題〉，《世界》，第44期（1949年8月），頁16）

58 姬田光義：〈中国革命と中国革命史研究について〉，頁21。

時研究的特色是：對於中共所從事的政治動向高度關心，而且都賦予「革命進程」的意義。如土改之後，天野元之助〈中国に於ける土地改革の新方向——土地法大綱より土地改革法へ〉，⁵⁹文學研究者波多野太郎的〈中国の現代文学と土地改革〉⁶⁰等諸篇論文，都是介紹最新的中國「革命」發展。隨著中國第一次五年計畫的完成，日本研究者也對於中國經濟開始注意：有安藤彥太郎〈中国の經濟建設と国家財政〉；⁶¹土井章〈中国第一次五年計畫の問題点〉及江副敏生、明野義夫「中国第一次五年計畫の考察」。⁶²這一部份是對戰後中國經濟政策研究最早的著作，然而由於資料難以取得，只能從官方報導中獲得資料，研究產出以現狀報導為主。

二、實證研究

若將革命史觀作為當時日本學界的主流理論，「實證研究」（尤其是實態調查、田野調查部分）則作為另一方面研究生產的主要方法。戰後以來日本擁有戰時的實證研究的大量原始資料，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有一波研究高峰。原本這些研究在戰時屬於「敵性研究」，只能用中國停滯論作為預設，並以「輕蔑／落後」做成結論，在前述思想解放之後，形成了一波以民俗人類學為基礎的研究高峰。戰時中的實態調查研究成果從在一九五二年開始出版的《中国農村慣行調査》⁶³開始，之後有林惠海《中支江南農村社会制度研究・上》；⁶⁴金崛誠二《中国の社会構造——アンシャンレジームにおける

59 天野元之助：〈中国に於ける土地改革の新方向——土地法大綱より土地改革法へ〉，《松山商大論集》，第2卷，第2期（1951年6月），頁57-81。

60 波多野太郎：〈中国の現代文学と土地改革——白毛女から暴風驟雨〉，《横浜大学論叢》，第3卷，第5期（1952年1月），頁289-312。

61 安藤彦太郎：〈中国の經濟建設と国家財政〉，《人文科学研究》，第17期（1955年4月），頁115-136。

62 轉引自古島和雄：〈東洋史回顧と展望〉，《史学雜誌》，第65卷，第5期（1956年5月），頁470。

63 中国農村慣行調査刊行会（編）：《中国農村慣行調査》（東京：岩波書店，1952-1958年）。

64 林惠海：《中支江南農村社会制度研究》，上卷（東京：有斐閣，1953年）。

「共同体」》⁶⁵等等，更帶動了實證研究的風潮。與一九四〇年代後期不同的是，原始資料更多的被正式出版成為「史料」，並成為研究素材。

《中國農村慣行調查》是一九二九年東亞研究所學術部委員會所立案，由滿鐵調查部與北支經濟調查所所組成「慣行調查班」所調查的，以河北四個村、山東兩個村作為調查對象。主要是以事件聽取（訪談）的方式，針對家族、村落、土地、所有、小作、水利等農村生活規範，使用法社會學的方法加以精細記錄。⁶⁶由於調查部的主導者後藤新平非常執著於實態調查，⁶⁷促成了日本在中國研究界中的獨特資料與研究傳統。像仁井田陞《中国の農村家族》，⁶⁸天野元之助《中国農業の諸問題》，⁶⁹窪德忠的「中共の宗教政策と民衆道教」，⁷⁰就是基於此而寫成，與前述《中国的ギルド》一起成為戰後日本關於中國農村研究的重要作品。

這部分研究的特色是以華北、江南的區域為兩大區域，用以詮釋整個「中國」，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會被認為資料過少。這些研究成果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系統著作，不如說東洋學（甚至是支那學）的色彩更重，不過從馬克思主義中引進了「共同體、階級、社會經濟史」等現代社會學概念，也為下一個階段的時代區分論做出基礎。實證研究取向由於政治因素，⁷¹資料取

65 今堀誠二：《中国の社会構造——アンシャンレジームにおける「共同体」》（東京：有斐閣，1953年）。

66 山根幸夫：〈東洋史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第62卷，第5期（1953年5月），頁440。

67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東京：勁草書房，1984年），頁351。

68 仁井田陞：《中国の農村家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

69 天野元之助：《中国農業の諸問題》（東京：技報堂，1952年）。

70 窪德忠：〈中共の宗教政策と民衆道教〉，《東洋文化》，第11期（1952年11月），頁1-26。

71 雖然那時研究有具有訪問性質，但是基本不存在長期駐在的可能，而且只能使用官方資料，並不能算是真正的田野調查與實證研究。這是因為，當時的日本人無法前往中國，也無法做田野調查，只能接受政府的公報宣傳。參見國分良成：〈建國五十年——中國研究與中國近代史的再檢討〉，《北大法學論集》，第51卷，第4期（2000年11月），頁1397。尤其表現在人類學與民俗學上的轉換在日文學界已經有公論。「主要戰前以維也納學派為主流，而在中國實地調查的民族學、人類學者們。在戰敗回國後參加了佔領軍『民間情報調查局』（GHQICIE）主導實施的全國層次的社會調查（1947-50），一方面作為與美國學術交流出發點的同時，也與維也納學派歷史人類學系譜、民族研究所的調查經驗斷絕。」

得難以進行，⁷²而且園田也指出「戰前的亞洲研究（尤其是田野調查社會學研究）帶有強烈的軍事侵略色彩，社會學者在主觀上對此十分小心（感到排斥）。」⁷³證明瞭戰後與「戰前東洋學」脈絡逐漸淡化（但是並未消失）的表現。以上的變遷，以一九五三年成立的「亞細亞政經學會」為代表，該會主要以區域比較研究為研究路徑，五月第一回大會在慶應大學開辦，由東洋學者組成，主張針對所欠缺的「近現代化」面向加以注目。⁷⁴

此後，在一九五八年設立的亞細亞經濟研究所，從人、組織與資料來說，在初期都更加體現繼承了戰前亞洲調查研究的系譜，而且同所的圖書資料部也持續製作戰前殖民地機關調查，並加以體系化而整理出書誌目錄。但在調查的方法與亞洲認識的模組則是以「斷絕」為特色，實際來說，研究所卅週年時的紀念文集中，對於戰前的研究幾乎沒有提及，作為總論的「地域研究論」的執筆人山口博一，也只略略提及橘樸與矢內原忠雄的研究。⁷⁵由此看來，亞細亞經濟研究所包含的意義除了採用新的方法視角之外，也代表了政府對決策智庫的一種需要，其研究的目的與方法都與其他學界成員有較大的不同，因此可以將一九五八年亞細亞經濟研究所的成立視為日本中國研究的重要轉折點。⁷⁶

參見末廣昭：〈他者理解としての学知と調査〉，《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第6卷（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頁12。

72 在實證上，雖然這段時間也有「調查性」著作的出版，著名的有：仁井田陞：《中国の社会とギルト》（東京：岩波書店，1951年）；《中国の農村家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内田智雄：《中国農村の分家制度》（東京：岩波書店，1956年）、旗田巍：《中国農村と共同体理論》（東京：岩波書店，1972年）等。但是這些著作皆使用戰前戰時的文獻與調查資料，也就表示戰後幾乎沒有長期田野研究獲得一手資料的可能。參見園田茂人：〈フィールドとしてアジア〉，收於溝口雄三等（編）《交錯する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頁31-32。

73 園田茂人：〈フィールドとしてアジア〉，頁23-24。

74 山本達郎：〈東洋史回顧と展望〉，《史学雜誌》，第63卷，第5期（1954年5月），頁434-436。

75 末廣昭：〈他者理解としての学知と調査〉，頁4。

76 亞細亞經濟研究所作為區域研究與政策研究的重鎮，在一九六〇年代之後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同時也是日本政府決策與研究的重要機構，受篇幅與時期限制，本文僅將其定位為一個轉折點而無法詳細討論，並留待後續研究中加以補充。

綜上所述，此時實證研究表現在馬克思主義者對田野調查資料的研究，並由此提出的革命史觀與「時代區分論」，原因在於舊滿鐵與東研的從業人員本身所帶有的社會主義性格（研究者理論喜好），加上中國實際調查的經驗（資料）結果；這些研究雖然具有社會主義的思維，但是也不能說沒有東洋學的色彩。相對於亞細亞政經學會（與其後的亞細亞經濟研究所），接受「區域研究」方法論的影響所表現的「斷絕」特色。這表示，學界在當時也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思想系譜，這兩種不同的視角與方法，在六〇年代之後，受到美國的影響，進一步對立。

三、時代區分論

如前所述，一九五〇年之後，支援革命史觀的研究者更加迫切的希望日本走向社會主義道路。比如前述一系列關於革命的討論中，有針對時事的土地改革（石川忠雄），也有對於國共內戰的階級定位。其中所內藏的馬克思主義的階段論，都使得中日兩國的相對位置開始微妙的轉變。因此，五〇年代中葉就開始了要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藍圖，積極的找尋現在中國應該放在那個位置？而其中分期的原因、如何能到下一階段？都是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橫跨了所有東洋史各時期領域，每個時期致力於說明自身是奴隸、封建或是資本主義社會；為了此一目的，每個學者不只要對自身的專門領域（時期）研究，也要對前後的時期有概念，從而跨越了對單一朝代的理解。當時的「時代區分論」（論爭）戰後最早的對跨時代整體東洋學界都產生影響的重要課題，甚至是日本史各時期的學者也試圖把自身專門做出分期。

時代區分論背後的意義是強調世界史中的「共通性」，早期的著作包括從翦伯贊《中国歷史概要》⁷⁷開始、西嶋定生「歷史的省察の方法について」、⁷⁸鈴木俊、西嶋定生編《中国史の時代區分》⁷⁹等。以上著作混雜著各

77 翦伯贊、邵循正、胡華（編著）：《中国歷史概要》，波多野太郎（譯）（東京：一橋書房，1956年）。

78 西嶋定生：〈歷史的省察の方法について〉，《理想》，第283期（1956年10月），頁11-31。

時代的歷史分期，主要是總論式的寫法，但大體上都不脫離馬克思的發展路徑與模式。近代方面的分期討論則有安藤彥太郎「近代中国の時期區分」、⁸⁰胡繩「中国近代歴史の分期問題」、⁸¹金沖及「中国近代歴史時代區分問題にたいする意見」⁸²等，自此加入了很多中國學者的觀點，馬克思主義的影子更重。⁸³

「時代區分」的作用十分微妙，不但暗示了寫作者本身的中國立場，也隱藏了對日本的發展期望，甚至影響了歷史學界中「近代」與「現代」研究者的研究範圍。自此之後時代區分始終是日本中國研究的主要軸心。這樣的基本認識，是由於日本學界從近代化東洋學、戰時調查到馬克思主義一脈的轉變系譜中誕生的，同時也含有對「東方／西方」、「日本／中國／亞洲」的多元情愫，呈現複雜的樣態，也是直到現在日本中國研究界中的重要（甚至是首要）的研究主題。綜合來看，此時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也是在前述美國「對日文化政策」的立場上誕生，可以體會到這些學者雖然一方面受到美國與戰敗影響而排拒帝國主義「大和精神」，但又不願完全走美國路線的想法。

若將馬克思主義或近代化理解為「普遍性」的思考的話，也有對此反對的學者，這些學者很多則是強調中國的「傳統與特殊」。如島田虔次在對明代心學的研究中，提出要從精神史的研究途徑中發掘中國的特殊性，⁸⁴以及竹

79 鈴木俊、西嶋定生（編）：《中国史の時代区分》（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

80 安藤彥太郎：〈近代中国の時期區分〉，《早稻田政治經濟學雜誌》，第140期（1955年5月），頁25-40。

81 金沖及：〈中国近代歴史時代區分問題にたいする意見〉，《歴史研究》，1955年第2期（1955年2月），頁37-51。

82 胡繩：〈中國近代歴史の分期問題〉，《歴史研究》，1954年第1期（1954年1月），頁5-15。

83 關於近代歴史分期的部分文獻，可參見市古宙三：〈東洋史回顧と展望〉，《史學雜誌》，第66卷，第5期（1957年5月），頁513。

84 請參見島田虔次：《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東京：東洋文庫，2003），共分上下兩卷，本書初版為一九四九年三月。島田指出，由明朝心學看來，中國雖然開展過如歐洲般「啟蒙運動」（合理主義思潮）的人本思想轉變，但是被清朝權力所鎮壓，此一運動就再也沒有出現過。這個事實的重要意義就是，「近代中國根本無法到達市民社會。」（頁13）島田認為中國雖有近代市民社會的動力，但一直沒有成形，因此使用了「挫折」

內好提出中國的道德力量，以「回心」型文化形容中國。⁸⁵都是早期中國研究中，關於文學思想的重要成果。在史學方面一九五七年出現對亞細亞史概括性捕捉的嘗試為例：梅棹忠夫的「文明の生態史觀序說」⁸⁶不以傳統東／西二元對立的角度，而依照近代化的理解，將日本和英國分為高度文明發展的「第一地區」與此相對的是中間的「第二地區」，此兩者的歷史構造是全然不同的，包括社會發展的階段等等都不一樣。⁸⁷這種說法中提出了「亞洲特殊性」觀點，也是日本中國研究特色重要的中國特殊性視角，在後來的發展理論以及現在盛行的亞洲論中，都扮演了主要的角色。⁸⁸

結論：日本中國研究中的延續與斷裂

本研究聚焦於戰後日本中國研究「延續／斷裂」的雙重性格，來檢視這終戰後十數年學界的發展。而這個兩面性，不能只檢視日本的「左派／右派」的狀況而下判斷，而必須關注日本在伴隨「革命史觀」出現的一整套知

一詞，引發了當時社會主義者的批評。另外在方法論上，島田在本書中採用對精神史的探究方法，指出明清思想的不連續性，對於當時史學通說中的中國近代包括「明清」抬出反論，認為「中國的近代並非只有政治經濟體系，而必須研究精神史的基礎。」（頁15），島田並以此主張要注意到中國的特殊性。詳細的論證研究參見吳震：〈十六世紀中國儒學思想的近代意涵：以日本學者島田虔次、溝口雄三的相關討論為中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1卷，第2期（2004年12月），頁199-228。

85 請參考竹內好：《現代中國論》（東京：勁草書房，1965年）頁198-201。初版發行於一九五一年。

86 梅棹忠夫：〈文明の生態史觀序說〉，《中央公論》，第72卷，第2期（1957年1月），頁32-34。

87 近代化論在戰後思想始終雖然一直是要角，但是其中的性質常常不相同，民族論也是如此。敗戰之後的近代化論對於封建的各種條件在明治以後的日本以什麼方式存在加以關心，而這樣對於戰爭又是如何支撐，並由此討論要如何推動日本的民主主義。但這樣的「近代化論」隨著保守勢力的重新崛起，漸漸失去立場，講和前後是「為了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目的」而研究其中條件的「近代化論」。參見安藤良雄等：《日本の新生》，頁259。

88 大塚久雄指出「馬克思發展史觀」其實是融合了跨國與跨時空的概念，單一地區從「貢納制→資本主義」的直線發展並不能說是理所當然的。參見大塚久雄：《西洋經濟史講座》（東京：岩波書店，1960年）。主要目的是強調對單一社會整體性理解的必要性，也是後來美式區域研究在日本實踐時的重要基礎理論之一。

識與社會周邊脈絡。也由此才能理解日本的中國研究特性中，為什麼會同時存留下馬克思主義與東洋學的因數，成為延續到現在日本中國研究界中的「執拗低音」。相對於一般認為戰後思想系譜「斷絕」的說法，本文同時提出「延續」的因素來詮釋，並且指出，這兩種思維在日本思想之中經過調和而辯證的成形，成為日本中國研究的特殊體現。

作為事件的「戰敗」所帶來的主要是對「天皇制／軍國主義」反抗的「民主主義／和平主義」思潮，從而在「世界史的基本法則」討論會中呈現，強調的是世界上普遍性的發展可能。本文藉此指出，初期戰後日本中國研究一轉為歐美式觀點，以否定東洋來解釋戰敗，再一次的採取了脫亞的道路。而當時東西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紛爭開始進行，因此即使是脫亞，也有兩種道路可以選擇。進一步隨著社會主義中國建立之後，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就「中國／西方」利用馬克思主義加以結合，中國不僅不「停滯」，而且還比日本進步，於是對古典中國的尊敬與社會主義中國的期待在心理上合而為一，其中又夾雜著對「古典日本／帝國日本」的反抗動力，因此當時的中國研究者的期待，反映在革命史觀，並且不斷想要從時代區分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戰前思維的延續首先表現在研究材料上，雖然是戰時的調查，但是被賦予了現代科學性的意義，同時也成為構築時代區分論的重要素材。但在研究精神上，除了重視「現地調查」（田野研究）成為日式中國研究的重要特色。但隨著國際情勢與兩國關係的變遷，戰後田野研究系譜，由於資料的來源不足，迅速衰弱被取代。其次，在區域研究方面，以「中國研究所」與「亞細亞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組織為例，隱含了實證社會研究中「連續／斷絕」的兩面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主流雖然是以「世界史的位置」作為參考點的普遍性思維，但也有有大塚、梅棹等史學者對於「亞洲／東方」論點，是日本東洋學與亞洲論中的特殊論脈絡，等到革命史觀退潮後，就可看出這部分的重要性。

之後由於冷戰因素，一九五〇年代後期開始研究主流為「沒有調查的馬克思主義」，也就是久保／江田所稱「意識形態中心」研究，發展到之後變

成六〇年代到八〇年代的「文獻至上主義」，不但造成了對中國情勢的容易誤判（對於中蘇共分裂、文革等重大轉變反應不及），也造成研究者投注太多信念在中國的形象上，無法客觀的研究中國。諸如此類，種種學界與研究者心理的變化歷程，必須從戰後馬克思主義在日本重建的系譜中找到解答。在討論日本戰後的意識（尤其是中國觀）時，不應該忽略了這段關鍵年代學術變遷的系譜。本研究藉由對「日本學術研究」的研究、整理與討論中，瞭解戰後初期日本學者在研究中國時，在文化關懷與自我定位中同時具有的「延續／斷裂」的系譜，這段思想歷程也是一九六〇年代各種社會運動中對於日本「主體性討論」的遠因。[§]

§ 感謝國科會提供「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提供相關經費，計畫編號NSC-096-2917-I-004-105。